

苏修短篇小說集

摘译

增刊

苏修短篇小说集

《摘译(外国文艺)》增刊

上海人民出版社

苏修短篇小说集

《翻译(外国文艺)》增刊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5 字数 242,000

1975年12月第1版 1975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547 定价: 0.84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帮凶和帮忙

- 读《苏修短篇小说集》……………梅希雪 (1)
- 身居要职 …………… (11)
- 边 缘 …………… (65)
- 入党介绍 …………… (85)
- 扎格达伊金和他的孩子们 …………… (95)
- 宴 会 …………… (108)
- 低声说话的人 …………… (127)
- 柳辛卡 …………… (136)
- 有毕业文凭的未婚妻 …………… (146)
- 当小城欢笑的时候 …………… (153)
- 哑 巴 …………… (166)
- 生死斗争 …………… (179)
- 叶戈利哈的遗嘱 …………… (224)
- 第一次领工资 …………… (285)
- 报 复 …………… (310)

帮凶和帮忙

——读《苏修短篇小说集》

梅 希 雪

政治上反动，艺术上腐朽，是摆在我们面前这个短篇集子的特点。为什么还要翻译它呢？答复是：为了了解敌人。

文艺历来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承和发展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极力强化法西斯专政，导致苏联的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民怨沸腾，反抗斗争连绵不断。以勃列日涅夫为头子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这种困难处境以及摆脱困境的愿望不能不在文艺中反映出来。他们除了在政治、经济领域里加紧推行一系列修正主义的政策，敲骨吸髓地压榨和残酷地镇压苏联人民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则要求文艺密切配合苏修的政治路线，对读者施加“不可抗拒的影响”。

究竟怎样才能解决日益深化的社会矛盾呢？在苏修文艺家中出现了两派不同的意见。哪两派？从本集收编的十四篇短篇小说中可见端倪。

《身居要职》和《边缘》属于这样的一派：正面歌颂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为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涂脂抹粉，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进行辩护，妄图以此来解救他们的社会危机。

近几年来，谁不知道苏修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叫做“当代英雄”的人物呢？普隆恰托夫（《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切什可夫（《外来人》）、维克多·拉古京（《炼钢工人》）、鲍勃罗夫（《适得其所的人》）、波塔波夫（《奖金》）……一个个相继登场；每一个人物的登场都引起文艺界一阵喧嚣和喝彩，说什么这些人物的出现是“时代的命令”。什么“时代的命令”？说穿了，无非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摆脱困境的政治需要。“当代英雄”们凭借什么帮助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摆脱困境？据说，靠他们的“党性和公民性”。而这“党性和公民性”究竟是什么东西，看看《身居要职》的主人公李赫科夫就清楚了。

李赫科夫原是一个工人，业余大学毕业后成了工程师。这时，正象他的妻子所说，“尽有规模宏伟、前程远大的”职位摆在他的面前。但是李赫科夫却没有去寻找这种美好的前途，而是当了个“坛坛罐罐”车间的车间主任，不但工资暂时比当工人时低，而且困难重重。为了建成车间，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他拒绝了妻子的劝告，顶住了同事的嘲笑和刁难，“全力以赴地扑在生产上”，甚至连家庭幸福和儿子的性命都赔了进去。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意识到这是一种“需要”。原来，苏修为了对外侵略扩张，推行“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致使本来就很不景气的苏修经济更加千疮百孔。物品奇缺，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广大群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李赫科夫不惜一切地抓“坛坛罐罐”生产，正是为了在保证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前提下，装模作样地“解决”苏修日用品奇缺的问题，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和消除人民群众的不满与反抗。由此可见，所谓“党性和公民性”，就是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无限忠诚和对修正主义面临的困难局面的“高度责任感”。在这种“党性和公民性”里，直接反映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毫不隐瞒地说出为了摆脱困境他们打算干什

么和怎么干。所以，我们不仅可以把这种“当代英雄”看成是勃列日涅夫集团的直接传声筒，而且应该把他们看成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路线和政策的图解。要了解当前苏修统治者面临着什么样的矛盾吗？要知道他们迫切需要什么吗？要看看他们究竟想怎么解决社会矛盾吗？就请一个个地去分析那些“当代英雄”吧。

至今出现的“当代英雄”，大多是修正主义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但也有老资产阶级分子，《边缘》中的富农分子阿基姆就是其中的一个。

阿基姆被当做英雄人物来歌颂，这也是一种需要，即解决农民“对土地的爱”的需要。众所周知，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农民不堪城乡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纷纷离乡背井，流入城市，造成农村劳动力严重匮乏、大片土地荒芜的局面。正是为了扭转这种局面，阿基姆登场了。据说，阿基姆是属于这样一类人物：他不懂为什么有人“对一切都不满意”，他觉得今天的苏修社会美妙极了，“在世界上生活生活还是有意思的”，“应该在土地上努力一番”。他的确是“努力”的，努力扩大自留地，并且努力把自留地摆弄得“丰富多彩”，“有一个人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不仅如此，阿基姆还把自己的这种努力和对土地、对生活的爱同社会帝国主义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他故意抹煞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剥削、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尖锐矛盾，却宣扬什么：“我们强大的国家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如果每一个家庭都和睦，都步调一致，都富裕，那末，整个国家也就富裕了。”可见，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阿基姆都是象勃列日涅夫集团所要求的那样，以“主人翁的姿态”，即最能体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态度劳动着。这就决定了阿基姆的地位。小说中的那个阿历克谢不是一再教导年轻人“不要回避阿基姆大

叔”，并且要向他学习吗？阿基姆不是也一本正经地教训着“接班人”吗？这正表明了苏修新老资产阶级的密切关系。阿基姆虽然没有站在“当代英雄”的前列，但却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支柱和老师哩！

本集收编的大部分作品属于另一派。这一派作品没有去歌颂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而是通过对个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现代市侩”的揭露，以及对一些“小人物”遭遇的描写，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对苏修社会现状的某种不满，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今日苏修社会中的一些丑恶现象。

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在早已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的苏修社会，金钱就是上帝，商品关系支配了人与人的关系。先说《哑巴》中的瓦尔奇斯吧。瓦尔奇斯平时就恪守“沉默是金”的格言，和哑巴差不多，而当他一旦真成为哑巴时，从主子到妻儿谁也没有发觉到这一点。这看来有点怪，其实并不怪，因为他对主子来说本来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而对妻儿来说也不过是一个“物质享受的供应者”，一只钱袋而已。会不会说话，这是无关紧要的。这就如他的同事所说：“一切事情在于钱”。

“一切事情在于钱”，这正是今日苏修社会关系的逼真写照。为了过“高水平生活”而充当掮客的戈加·巴兰楚克（《低声说话的人》）、把嫁人当作攫取财富手段的柳辛卡（《柳辛卡》）、为争夺遗产而盼望老人早死的叶戈利哈的儿子媳妇（《叶戈利哈的遗嘱》）等，都无一例外地在“钱”字上打算盘，围着“钱”团团转。这一点，在《当小城欢笑的时候》中表现得更加明显。那个叫做玛达姆的老板娘有个漂亮的女儿，而加拿大的一个俄国资本家的继承人涅斯托尔有来自加拿大的毛皮上衣。在这两个人的眼睛里，漂亮的姑娘和贵重的皮上衣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都是可以赚钱的商品。上衣要有上等皮料，缝制要考究，才能卖

好价。玛达姆在女儿身上不惜工本，也无非是给这个商品以精致的包装。这两个人一个高价出售自己的女儿，一个高价出售皮上衣，他们终于奇妙地通过商品结合到一起。总之，在这里，一切都成了商品，马克思所说的商品形式的普遍化重新支配着苏联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

象涅斯托尔或戈加这类社会的寄生虫，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就是商品交换，就是所谓周转自由或贸易自由。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种周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这种两极分化的过程，在苏修那里正在日益加剧地进行着。扎格达伊金的一家，父子、兄弟成了对头，因为小儿子费多尔成了建筑托拉斯的经理，也就是成了新的垄断资本家，而父亲、哥哥却仍然是建筑工人，一个家庭分化为两个对立的阶级。费多尔住在自己的“宫殿”之中，而父亲和哥哥却“好象后院里的两条狗”。《入党介绍》中的厂长鲁胡拉和扎格达伊金的小儿子费多尔一样，是从工人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官僚垄断资本家。鲁胡拉原是钳工阿拉海尔的徒弟，因为“头脑灵活”等等，而很快满了师，定了级，又上了车间的光荣榜，入了党。最后当上了厂长，进入苏修的统治阶层。

在苏修社会里，一个厂长意味着什么呢？鲁胡拉名义上的工资是二百五十卢布。可是他不但从原先住的一条小胡同里的一所旧房子搬进了市中心的高质量的新房，而且在纳尔达兰有了一座私人别墅。建造别墅的钱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从哪里来？还不是从工人身上榨取来的剩余价值！他可以通过“开后门”的途径，把厂里生产的一部分发动机高价出售，还可以把它安装在自己家的水井上。这些发动机自然是不算在工厂的生产统计表上的，它们是鲁胡拉的“非法”的但是公开的“外快”。就

这样，鲁胡拉“合法”地把整个工厂，包括它的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全部产品，化为他们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私有物。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早已在不知不觉之间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鲁胡拉和他的师傅，也不再是师徒关系，而是资本家同雇佣工人的关系了。小说《宴会》就写到厂长布尔拉克，既可以任意动用工厂的资金大摆筵席，又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一个工人。老爷们吃得开心了，就要给厨师加奖金；等到这位厨师被捉弄得发起酒疯来，触犯了老爷们的尊严，就立即以“行为悖理和无故旷工”的罪名被开除了。

这些以勃列日涅夫为总头目的戴着红帽子的官僚垄断资本家，与老沙皇时代的资产阶级相比，更加疯狂、贪婪与残酷，给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果以为所有的工人都会象鲁胡拉和费多尔那样爬上厂长或经理的宝座，那就荒谬得很了。后者只是极少数，而大多数工人，都被迫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遭受着沉重的剥削、奴役和压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小说《第一次领工资》中的童工瓦锡卡的命运，是多么悲惨！父亲死于一场事故之中，于是这个瘦弱的孩子不得不过早地帮助母亲挑起生活的担子，做了童工。为了不受欺侮，或者说为了保住饭碗，可怜的孩子又不得不用第一次领到的工资买酒请客。这个瓦锡卡，很自然地使我们联想起契诃夫笔下的万卡。两个孩子，一个生活在老沙皇的黑暗年代，一个生活在新沙皇同样黑暗的年代，他们的命运是何等相象啊！《报复》中的列齐柯和红头发是两个孤儿，他们比瓦锡卡更加孤立无援，落得流浪在街头。眼看着那些“丰衣足食的幸运之家”，列齐柯心里滋长着一种说不出的仇恨。瓦锡卡和列齐柯弟兄都是工人的子女，这几个孩子的命运表明标榜社会主义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已经到了何等残忍的地步。

读者一定会问，既然这些作者的目的是要解救苏修的社会危机，为什么却又暴露这个社会的丑恶呢？他们的做法和他们的目的岂不矛盾了？不矛盾。在苏修，常常有人把这一派作品与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相类比，就说明修正主义的评论家们是理解这一派作家的用心的。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为什么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呢？为的是“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同样，今天苏修这一派作家之所以描写苏修社会的某些丑恶现象，目的完全是为了保障现在的修正主义社会制度。

请看他们对苏修社会矛盾性质的有意歪曲和掩盖吧。扎格达伊金的家庭不和，鲁胡拉的师徒反目，《宴会》中厨师的遭遇，童工瓦锡卡和孤儿列齐柯兄弟的悲惨命运，所有这些明显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事实，作者们是怎样解释的呢？费多尔被说成是白色大地上的几只黑色苍蝇；鲁胡拉的蜕变被解释为个人品质问题；《宴会》中厂长对厨师的残暴被说成是粗暴的作风；而在《第一次领工资》和《报复》中几个孩子的遭遇更被归咎于不可捉摸的命运之神。说什么世上有一种“无缘无故的不公道”，而“不是任何哪个人的罪过”。总之，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被作者们一笔抹煞了。

再看他们对待自己所暴露的人物的态度。费多尔、鲁胡拉、布尔拉克这些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是苏联人民的直接压迫者、剥削者。但是看看费多尔的父兄对费多尔那一席推心置腹的谈话吧！那真是充满了爱护和关怀啊！这哪里是苏联工人的思想感情？分明是作者在欺骗工人把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当作“自己人”。《入党介绍》的作者对鲁胡拉的处理似乎严厉一些，要开除他的党籍。但那立意更高，是要丢车保帅，丢掉一个鲁胡拉，证明苏修党还是好的。阿拉海尔在做出撤销对鲁胡拉的入

党介绍的决定时，作者写道：“在他心里觉得轻松了，轻松多了”。这就是说只要开除一个鲁胡拉就万事大吉。这不是更大的欺骗吗？至于《宴会》，作者对厂长布尔拉克等人，更是皮鞭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在厂长做出开除厨师的决定后，作者花了许多笔墨描写工厂头头们的负疚和悔恨，为什么这样写？为了给他们开脱罪责！很清楚，这派作品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暴露”实在是为了开脱。

比起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的态度来，这一派作家对所谓“现代市侩”的鞭挞要重得多。作者们对柳辛卡、戈加、涅斯托尔等人，深恶痛绝之情溢于言表，喜笑怒骂，尖酸刻薄。《柳辛卡》的作者甚至情不自禁地站出来高呼口号：“请谨防柳辛卡！”这种态度实在是大有深意存焉。前面已经说过，柳辛卡也好，戈加也好，都是现代苏修社会关系的产物，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的产物，不触及这个社会制度，不触及这一条路线，而揪住柳辛卡之类的人物狠打，这是要揪住小鬼保阎王。这是竭力要人们相信，苏修社会全是让柳辛卡之类的人物搞糟的，以便把人民的视线和仇恨转移到这些人身上。而且“谨防柳辛卡！”，“谨防”的主语是谁？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象柳辛卡这样的小资产者介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时时刻刻发生着分化：挤上去或者掉下来。工人阶级是不用“谨防”柳辛卡们掉下来的。倒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特权要“谨防”自己院子里挤进来更多的人。《柳辛卡》的作者就是站在这个阶级的立场上警告自己人：扎紧篱笆！作者维护和巩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更加暴露无遗了。

还有，这一派作品不象另一派作者那样通过形形色色的“当代英雄”公然咒骂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鼓吹和实行对人民群众的法西斯统治；而是或多或少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好象

关心和同情下层人民。但这只不过是修正主义两面派嘴脸中的另一面罢了。仔细分析一下他们笔下的工人和劳动人民形象，哪一个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代表？鲁胡拉的师傅？费多尔的父亲和哥哥？他们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温情脉脉，对修正主义社会充满幻想。《宴会》中的厨师？他被歪曲为一个酒鬼，一个小丑。作者与其说是同情他，不如说在嘲弄他。几个工人阶级的后代呢？瓦锡卡逆来顺受，列齐柯盲目报复。两篇小说的作者象商量好了似的，要用这两个不同的形象从正面和反面宣传对修正主义统治的忍受：“报复也没有改变任何东西。一切依然如故。”

那末，能不能把这一派作品叫做批判现实主义文艺呢？根本不能。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文艺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开始激化、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那时，作家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除了受到他们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之外，还受到时代发展的局限。但是今天不同了。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世界传播了一百多年，社会主义已经在一些国家取得了胜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已经越来越认清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腐朽反动，正在为最后埋葬这种制度而进行斗争。苏联人民也正在为重新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还以暴露社会帝国主义某些非本质的现象来掩盖它的根本矛盾，妄图以此阻挡历史的车轮，保存资本主义制度，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时代的局限，而只能是修正主义者反动的政治立场和抗拒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行垂死挣扎的表现了。所以如果说已往的批判现实主义文艺还起过某种进步作用的话，那末今天苏修的这种文艺就只有反动的作用了。而且，在艺术上这类作品也与批判现实主义文艺根本不能相比。事实上，这一派作品和描写“当代英雄”的那一派作品本质上毫无区别，都

是修正主义社会制度和政治路线的产物，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妄图解救危机、扑灭人民斗争烈火的工具。记得，鲁迅先生曾经把剥削阶级的文艺分为“帮忙文艺”和“帮闲文艺”，指出帮忙和帮闲实际上都是帮忙。今天苏修文艺中的两派也都是要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帮忙。所不同的是一派张牙舞爪，公然挂出御用的招牌，可谓之帮凶；另一派呢，却有点“在野”的味道，以小骂掩盖大帮忙，不妨叫它帮忙。这种“帮忙文艺”对苏修统治者的态度就象鲁迅所揭露的“新月派”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批评一样，看起来是在批判对方，实际上“是一番替对方设想的警告”，虽不象“帮凶文艺”那样直接地表现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但它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耿耿忠心及其对修正主义国家前途的焦虑心情也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所需要的。苏修统治集团允许它存在，原因就在这里。

俗话说，一叶知秋。这本短篇小说集可以看成是当代苏修文艺的一片树叶。两种不同派别的作品一个从正面，一个从侧面反映了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当前处境的忧虑和摆脱困境的急切心情。这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敌人。

在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统治下，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是不可能出土的。但正如鲁迅在《野草》的题辞中所描绘的那样：“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到那时，“帮凶文艺”，“帮忙文艺”将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一起被野火烧成灰烬，而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将在烈火中诞生。

身居要职

作者 尤利·格拉契夫斯基

载苏修《顿河》杂志 1974 年第 3 期

—

多少年来他听到的只是：大学，大学，大学……起初是母亲念叨，后来是他妻子。而他的学习，即使不算完全被迫的话，也说不上卖力。因为他有家，有两个孩子，在车间里他也不算最差的一个，得保持威信。家里的一切又并不那么顺遂：母亲和岳母相处得不很和睦，你要进行劝解，但又不能触犯她们的自尊心，任何一方都不能得罪。她俩都自高自大，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比如，教育孩子应该是抚爱还是打骂；打扫房屋应该用吸尘器还是用扫帚。

就说跟妻子吧，也并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能找到共同语言的，何况又添上了两个女人，各有各的要求……

他的妻子在厂里已经担任重要的职务，因此他也不能落后。于是他学习，力求上进，终于好不容易拿到了“金属冷加工工艺工程师”函授毕业证书。是在第十一个年头通过的论文答辩。但这又为的是什么呢？

一直到现在，他的生活即使清苦一些，总算驾轻就熟，从来没有越出轨道。可是这下子却立刻出现了岔道：往后该怎样生活，向何处去？

要是他不再干冲床这一行吧，工厂里可没有一种工程师的职位挣的钱比这还多。但谁会答应他这个有毕业证书的工程师依旧当一名普通的冲床工呢？我们培养你，一年给你两次额外休假，送你到这儿那儿……你去参加考试来回跑，没有花过一分钱。李赫科夫，你算一下，有多少次呀！

就算他学习时自己也花了些代价：经常搞到深夜，交卷即使拖拖拉拉，也还能够凑合。他少睡觉，放弃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就这样，消磨掉了自己的青春。

但是要知道，他从没拒绝过休假，这一点是无法争辩的，而且领取无偿的补助金，也向来显得心安理得。如今，厂长提起这一切，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只是为了加强自己的说服力。他尽他的所能，连劝带命令地说：“需要，李赫科夫，需要！我们在新的工段需要的不是官僚主义的领导，我们需要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需要自家树干上长出的枝子——总之，就是需要象你这样的人呀！”

工程师这个词儿，他听来觉得很新奇，仿佛在部队里从士兵一下子提升为军官。但这个词儿在厂长嘴上倒是很自然的，并没有讨好的意思。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李赫科夫表示同意。

他认为，至少自己的妻子会理解他的。但这一次，女人们象事先商量好了似地异口同声地说：“你为孩子们想过没有？过去你每月拿回家二百卢布，卖点力，还能多些。可是现在，每月固定工资是一百三十五个卢布。新的岗位上还有累进计件工资吗？新工段要经过组织阶段、试车、调整——还得把自己的私蓄都贴补上呢。”

可不是吗？真是毫无办法。但她们干吗十年来老是嚷个不停：大学，大学？……他起早摸黑，从来没有能玩个痛快，把最美

好的黄金时代都放过去了，又是为了个什么？要是当时不听她们的话，肯定也会及时行乐，不致白白浪费了自己的青春，而今天倒反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但妻子拉丽莎是一个精明的女人，一切事先都有个盘算。她反复说：“你已经取得毕业证书，尽可以另想别的办法施展你的才能：世界上又不是只有我们这一家小厂。比起我们这城市里的厂来，尽有规模更宏伟、前程更远大的……需要找寻，盖纳基，需要找寻！俗话说，放平的石头^①……”等等。

她说到“需要”这个词，正象厂长说话一样，听起来很有权威，不容争辩。

他的妻子就是这样的人：刚毅而倔强，善于发号施令，善于制服人。这些品质在工作上是很宝贵的，可是在家里……在家里要的是温存和体贴。他总还算是一家之主吧。他应该是这里的当家人。但是拉丽莎好象并不是这样想的。

好吧，他不象那些器量小的、骄傲自大的丈夫。但是该找什么工作，到哪儿去找呢？到省里，到公司管理处去吗？可是谁能担保，他在那儿一定能顶用？要是说去占别人的位子吧——这样的做法没有什么可羡慕的。他多少还有一点自尊心。

总之，不论这一大串矛盾使他感到多么烦恼，但他还是没有拒绝厂长的建议，接受了“坛坛罐罐”工段的工作（这是一些没事干的爱说俏皮话的人给新工段起的名字）。工段的正式名称是“日用品车间”。他当上了这个还不存在的车间的主任。

他当上了领导。真是可笑！

他生活中的新阶段也就这样可笑地开始了。这个新阶段是靠顽强争取考得“三分”而得来的。考得好些争面子的事，对他说来根本谈不上，但求不要补考就好了。可是对于他这个超龄

^① 俄国谚语“放平的石头，流不过水去”，意思是一件事情主要靠自己的努力。